

## 大陸當代商會及海外華商會研究之評述

魏文享\*

### 一、前言

1904年，晚清政府為謀民族經濟之進步並加強官商之溝通，頒佈了《商會簡明章程》，由此正式揭開了商會發展之序幕。此後，經北京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之提倡，商會成為普遍設立的跨行業組織。同業公會則多是在原有會館、公所基礎之上改組而來，自1918年後亦漸成為普遍性的分行業組織。商會和同業公會可以說是近代工商界最為重要的組織代行者，對於商人謀求經濟自治和政府調控工商均具有重要意義。而在1949年後，大陸商會卻走上一條曾經中斷而又復興的曲折道路。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大陸商會為工商聯所取代，而其性質則與原有商會迥異。同業公會在1956年後亦基本消亡。但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的發展，商會及行業協會組織又重新興起，數量及規模均迅速擴展。在中國加入WTO以後，商會、行業協會在社會經濟中之影響更與日俱增。其實，20世紀80年代以後商會史研究的興起固然有學術興替的內在機理，但現實因素的影響顯然是不容否認的。這本身就意味著，商

---

\*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歷史學博士。

會史之研究不可將當代商會之發展排除在外。不論是出於以史鑒今或持以今視昔之偏論，考察今日之商會發展與商會史的內在制度因素總是一項頗有價值的學術課題。

本文所指海外華商會主要指港澳臺地區之商會及歐美、東南亞、日本等國華商所設之商會。香港與澳門設立商會均極早，其發展模式並非一致，但均延續至今，其連續性得以保持，在港澳社會經濟中亦居於重要地位。在兩地回歸之後，兩地商會與內地之互動更為頻繁。臺灣在日治時期即有商工會，設立也較為普遍。在戰後，曾經改組。在 1949 年後，又改組為商業會，並延續至今，其發展與港澳又有所別。歐美、東南亞及日本等國之華商會均由華商依當地之法令成立的經濟組織，對於拓展華商在海外之社會、政治及經濟空間均具重要意義。本文所指大陸當代商會系指在 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以工商聯為主體的商會組織。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大陸與海外華商會之間的聯繫也日益增多，其研究也自應有所因應。特別是港澳臺商會，其發展道路不一，而其績效均極其顯著，連續性強，對於大陸當代商會建設的對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由此觀之，將上述差異極大的數種商會形態放置一起比而論道，對於整體性的瞭解商會史在這兩個方面的缺失，或許不無裨益。

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講，關於商會之研究與思考在商會正式創建之前就已開始。在商會籌建階段，盛宣懷、張謇及民間人士倡建商會的言論或許可視為此類。<sup>1</sup>在南京時期工商界人士對於商會、同業公會也多有討論。

---

<sup>1</sup> 關於近代對早期商會之言論在商會史研究的幾本代表性著作之中均有涉及，華中師大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洪振強對之進行了梳理，請參見洪

真正史學意義上的商會研究初由美國學者發軔，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大陸商會史研究才逐步發展起來。海外學者關於商會史研究的交流與討論也日益頻繁。至於今日，商會史研究已取得極為宏富的成果，出版資料集多卷，發表相關論文達數百篇，專著及博碩士論文不下二十餘本。但在已有成果之上，如何進一步推陳出新，則成爲新的挑戰。自 90 年代以後，學界關於商會史研究的學術評述及思考明顯增多。除對商會史研究的已有成果進行了系統總結，對研究方法進行了反思外，對商會史研究之發展方向亦有建言。除商會史外，相關評述也涉及到行會史研究、同業公會研究、會館史研究、商團研究等等。<sup>2</sup>但相關評論對於當代商會及海外華商會之研究情況均未予置評，這其實正是商會史研究所存問題的真實反映。本文

---

振強，〈近代國人對早期商會的認識〉，《安徽史學》，2004.2(合肥，2004.04)；魏文享，〈近代中國對工商同業公會的認知〉(未刊稿)。

<sup>2</sup> 有關商會史研究的評述文章在各個時期均有，在 90 年代以後更趨頻繁，思考也更加深入。關於商會史之評述有朱英，〈清末商會研究述評〉，《史學月刊》，1984.2(鄭州，1984.03)；徐鼎新，〈中國商會研究綜述〉，《歷史研究》，1986.6(北京，1986.12)；馬敏，〈近十年來中國商會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學刊》，2001.1(武漢，2001.01)；馮筱才，〈中國商會史研究之回顧與反思〉，《歷史研究》，2001.5(北京，2001.10)。關於會館史之評述有：王日根，〈國內中國會館史研究述評〉，《文史哲》，1994.3(濟南，1994.06)；馮筱才，〈中國大陸最近之會館史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0(臺北，2000.09)，頁 90-108。關於商團研究情況參見朱英，〈近代中國商團研究綜述〉，《近代史學刊》，2001.1(武漢，2001.12)。關於同業公會之情況參見魏文享，〈近代工商同業公會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2(北京，2003.03)。關於行會史研究之概況請參見朱英，〈中國行會史研究之回顧與反思〉，《歷史研究》，2003.2(北京，2003.04)。

盡力搜羅當代商會及海外華商會研究之成果並進行介紹，在此基礎之上針對商會史研究之問題，提出可能的努力方向。值得說明的是，雖然筆者竭力搜羅關於海外華商會研究之情狀，但仍未盡達己意。海外華商會之時段主要仍限於 1950 年代以前，關於臺灣商會及歐美商會的情況，瞭解也還遠遠不夠。姑試提出，以為拋磚引玉之效。

## 二、大陸當代商會之研究概況

1949 年至今，大陸商會的發展歷程頗為曲折。1949 年後，政府對原有工業會及商會進行改造，在此基礎之上籌建工商聯以管理私營工商業。1953 年，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並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縱向的工商聯組織系統。由南京時期延續而來的同業公會也被改組為工商聯的基礎組織。但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私營工商業不復存在，工商同業公會因失去存在的經濟基礎而歸於消亡，工商聯的職能也發生重要轉變，經濟性大為削弱而統戰性、政治性空前加強。

關於 1949 年後商會改組、工商聯的創建及改革開放以後民間商會的興起，不少學者進行了探討。劉建中對 1950 年代廣州商會的改組及工商聯的成立情況進行了考察。他認為商會為工商聯之建立提供了組織及制度性的基礎，而新成立的工商聯具有相當濃重的政府管理色彩，是政府在過渡時期所採取的工商管理策略。<sup>3</sup>馬敏對全國工商聯的成立及由此帶來商

---

<sup>3</sup> 劉建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廣州工商社團組織〉，「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香港，2000.7)。

會制度的轉變情況進行了分析，他認為 1949 年以後經濟體制及政治體制的變革導致商會制度環境的變化，而工商聯則適應了當時社會主義改造及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sup>4</sup>由朱英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課題《近代同業公會研究與當代中國的行業協會》對由近代商會、同業公會向工商聯、當代商會、行業協會的發展歷程進行了詳細分析。文中認為，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經濟建設的目標與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為適應過渡時期及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任務，政府以工商聯為主導對同業公會也進行了重組與整頓，從而使同業公會呈現出與民國時期不同的組織形態，使同業公會由民間性的自律性組織轉變成為兼有統戰性、民間性與經濟性的組織，並隨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及部門管理體制的確立，同業公會最終走向消失。當代商會、行業協會的發展則是經濟建設及政治改革的結果與需要。<sup>5</sup>縱觀商會史研究總況就會發現，大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1949 年之前，這一短暫的過渡時期基本被忽視。其實，就歷史上的商會與當今商會、工商聯的差異而言，追究商會是如何被改造、工商聯組織是如何契合進計劃經濟體制之中相關課題實具重要意義。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隨著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及民營經濟的發展，民間性的商會、行業協會又在各地興起。同期，自稱集統戰性、經濟性、民間性於一體的工商聯組織也面臨著新的挑戰。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一

---

<sup>4</sup> 馬敏，〈中國商會的現代演變〉，「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香港，2000.7)。

<sup>5</sup> 參見朱英、馬敏、彭南生、鄭成林、魏文享(合著)，《近代同業公會研究與當代中國的行業協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場以商會、行業協會為主體的改革先後在上海、溫州展開，並逐步蔓延到內地，而以當代商會、行業協會為研究課題的學術浪潮也逐步在政府部門及各相關學科領域展開。就目前情況來看，當代大陸商會所指範疇顯然更為廣闊，並非專指近代的地區性跨行業商會。在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系統，不少地區都樂於以民間商會的身份來爭取私營工商業者的認同，希望由此來接續近代商會的歷史，發揮「眾商之會」的真正作用。各地的行業協會也有稱行業商會者。還有不少地區建立了異地的跨行業商會，如在重慶設立的浙江商會、武漢設立的溫州商會等，這種情況其實是當前商會、行業協會發展還並未走上制度化道路的反映。就目前研究的重點來看，主要集中在工商聯改革、民間商會及行業協會的建立之上。

工商聯在建立之初即擔負重要的政治職責，具有強烈的官方色彩。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逐步被強化為聯絡私營個體工商業者的複合性組織，其法律地位及社會角色均極為複雜。隨著民間工商業者在工商聯組織中地位的加強，不少地區工商聯也傾向於向民間化發展。但整體來看，工商聯仍然屬於半官方組織。這種兩極局面實際體現了工商聯發展的兩種方向：究應維持半官方的地位還是轉變角色成為純粹的民間工商業自治組織。基於工商聯在現行政治經濟體制中的多位一體的特點，工商聯的改革就涉及到經濟管理方式、社團管理制度及國家－社會關係等多方面的問題。李寶梁認為，工商聯的前身是原有商會、同業公會，在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工商聯也被賦予了經濟性、民間性的特點，但是工商聯始終是作為黨領導下的以統戰性為主，兼有經濟性和民間性的人民團體，它的產生和存在始終是一種政治性的需求。與商聯的形成和發展不同，新興商會是我國改革

開放以來，各階層利益和社會結構不斷分化調整的產物。他建議，目前在中國，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之間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關係，民間商會作為一種社會組織紐帶和發展結合方式，它們與政府機構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相互補益，共同發揮作用，應該是促進社會整合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sup>6</sup>就現在較為主流的認識而言，加強工商聯的民間性、經濟性應是其發展的方向。也有不少學者強調工商聯組織之外由工商業者自行建立的商會、行業協會的作用。大多學者都肯定了民間商會在促進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王安嶺認為商會是民間組織的有效組織形式，是支撐市場經濟運行、保障自由有序、充滿活力而健康穩定的經濟結構必要的社會設置。它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有效監督和約束公共權力運行，使其服務於公共利益、公民利益和公共生活秩序。<sup>7</sup>還有不少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及中國加入 WTO 使中國民間商會的發展更為迫切。俞曉松概述了商會組織在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完善國際行商環境中的作用；介紹了商會組織為企業提供高效服務的多種功能；同時指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應按市場經濟的規範要求，儘快建立和完善商會體系。<sup>8</sup>褚霞認為近年來，中國出口貿易急劇下降與應對國際反傾銷不力有密切關係，主要與商會作用缺失有關。為了有效解決以上問題，中國政府與商會在應對反傾銷中應發揮主導作用。<sup>9</sup>張承惠認為，在中國民營經濟高速發展、加入 WTO 的形勢下，

---

<sup>6</sup> 李寶梁，〈中國民間商會透析〉，《天津社會科學》，1997.5(天津，1997.09)。

<sup>7</sup> 王安嶺，〈社會自組織與市場制度的建構——論商會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現代經濟探討》，2003.7(2003.07)。

<sup>8</sup> 俞曉松，〈經濟全球化中的商會組織〉，《石油化工動態》，2000.8(2000.08)。

<sup>9</sup> 褚霞，〈中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的新問題與政府和商會的主導作用〉，《科

急需對現有商會制度進行改革，原有的行政性協會的「二政府」色彩過於濃鬱，難以真正代表企業及行業利益，已有的不少民間性行業協會運作困難，政府應轉換思路，大力推動民間商會和行業協會的發展。<sup>10</sup>朱英認為，發展商會及行業協會，並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功能與作用，以適應市場經濟增長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求，是當前我國面臨的一個緊迫課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明確商會與行業協會的職能，下放權力；理順商會、行業協會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關係；加強商會、行業協會建設與運作的規範化；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商會法和行業協會章程。<sup>11</sup>此類研究其實反映出，在工商聯面臨制度困境的情況下，民間性的商會、行業協會已得到較為迅速的發展，但政府、工商聯與民間性商會、行業協會之間的體制關係仍未能理順。現有商會、行業協會雖然已在市場經濟之運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但仍未能完全適應產業發展的需要。

政府、工商界及學術界其實均已意識到這一問題，關於如何建立科學、合理、高效的商會制度及運作機制等問題受到多方關注。許多學者從商會內部治理結構、商會與政府關係、商會與市場關係等多個角度進行分析，運用的方法包括組織理論、社團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資訊經濟學等。較早對商會制度進行系統研究的是陳清泰等，他主編的《商會發展與制度規範》一書通過對商會發展歷史的考察，論述了商會在社會經濟生活及市

---

技與管理》，2003.1(2003.01)。

<sup>10</sup> 張承惠，〈新形势下應重新確定商會的地位與作用〉，《經濟界》，2003.2(2003.04)。

<sup>11</sup> 朱英，〈論發展商會與行業協會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2.4(武漢，2002.07)。



場資源配置中的性質、特點和作用，為我國商會制度改革及立法提供了理論依據。<sup>12</sup>關於商業行規也作為商會的運作規則受到重視。<sup>13</sup>崔校寧通過分析組織的內外交易成本，進而深入探討商會的組織特徵和激勵機制，認為應更新觀念，打破二元管理現狀，強化自主管理格局，構築商會體系內的分層管理體系。<sup>14</sup>潘西茜認為商會應居為政府、企業與市場之間的橋樑。<sup>15</sup>秦詩立等認為商會在管理服務市場方面相對單純的市場組織(以企業為主體)和非市場組織(以政府為主體)是可以有效節約交易成本的，從而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不應代替商會進行商會功能(產品、服務)的生產或提供，以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不過商會自身也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商會與政府間加強聯繫，以實現兩者的密切分工與良性互動。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認為，商會作為市場發達國家中協調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重要橋樑，其自身獨特的性質，使其可以在某些方面和某種程度上彌補政府和市場各自固有的缺陷。中國商會性質的改革要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以及政府職能改革、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結合起來。<sup>16</sup>他還認為，商會制度與

---

<sup>12</sup> 陳清泰，《商會發展與制度規範》(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

<sup>13</sup> 劉建民，《商業行規及其疑點、熱點、重點、難點》(上海：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9年)。

<sup>14</sup> 崔校寧，〈透視中國商會體系的定位與構建〉，《商業經濟與管理》2003.11(2003.11)。

<sup>15</sup> 潘西茜，〈商會—連結政府、企業與市場的紐帶〉，《改革探索》2002.2(2002.04)。

<sup>16</sup> 秦詩立，〈浙江社會科學〉，2001.5(2001.10)；〈商會制度與國家形態的互動演進—兼談我國商會改革〉，《上海經濟研究》，2003.6(上海，2003.06)。

國家形態間有著緊密聯繫，商會改革受制於國家形態也反作用於國家形態。范銳敏等探索了商會的法律地位問題，他建議在商法中商事主體這一部分，明確規定商會是與商人、商事主管機關並列的獨立的商主體，是社團法人，同時把商會的章程部分法定化，對商會的活動、目的、財務、內部運行等進行規制。<sup>17</sup>王安嶺認為應從市場發展與社會自組織的結合點上，認識商會發展的重要性，推動商會在利益整合、自律、政治參與、社會公益等方面的作用。<sup>18</sup>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健全商會制度的方略，對於現實中之商會改革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大陸各地政府部門也將商會及行業協會改革提上日程，希望以此改變經濟管理方式，建立更為完善的市場法制。各地政府積極開展調研活動，探索商會與行業協會發展之路。在 2001 年，無錫市政府就主持召開了「商會與市場經濟」國際研討會，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璠及眾多工商界人士均與會。會議就商會的性質、商會組織建設及商會的作用等問題展開討論，總體上肯定了商會與行業協會作為非政府組織對經濟發展與社會自治的重要作用，但也認識到目前我國商會、行業協會建設均還存在諸多問題。在重慶，也召開過中小企業與商會的研討會。在上海、溫州、武漢等地，關於商會、行業協會的改革及討論更是如火如荼。武漢市委託華中師大中國商會研究中心撰寫了武漢市商會發展的調研報告，報告提出武漢商會建設

---

<sup>17</sup> 范銳敏、劉凱，〈論我國商會的法律地位〉，《社會科學》，2002.4(上海，2002.04)。

<sup>18</sup> 王安嶺，〈社會自組織與市場制度的構建——論商會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現代經濟探討》，2003.7(2003.07)。

應發揮政府、學界、工商界的積極性，從法制、體制、機制三個方面進行推進。該市選擇以武漢市餐飲業協會作為試點進行建設，至今已一年有餘，餐飲業協會的市場適應能力及運作能力都得到增強。<sup>19</sup>陳剩勇以溫州商會為例進行了制度分析，溫州民間商會的制度供給是政府和商會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基於群體自發形成的內在制度在商會的治理實踐中起著主導性的作用。商會網路式的組織結構為會員建構了一個低成本的參與網路。他還認為民間商會的治理實踐具有不可低估的民主價值。郁建興等則立足于政府治理轉型與商會關係的視角，討論了溫州商會的興起、存在基礎與權力來源、政治合法性及行政合法性等問題，這些問題均是商會在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深層次的體制問題<sup>20</sup>。他們認為，商會發展應該去政治化，從市場角度定位商會；建立統一協調的管理機制；儘快制定行業協會法和商會法，確立其法律地位；積極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府—商（協）會—企業間的良好合作。浦文昌等的著作也討論了民間商會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並提出要從法制建設、政治改革、經濟立法等方面加以解決。<sup>21</sup>

---

<sup>19</sup> 關於武漢市商會及餐飲業發展情況的調查研究報告，請參見：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商會研究中心現代商會課題組，《武漢行業協會的發展、現狀及對策》，2003.12；《雙向合作與行業自治——關於武漢市餐飲業協會發展的建議》，2004.4。

<sup>20</sup> 陳剩勇、馬斌，〈溫州民間商會——一個制度分析學的視角〉，《浙江大學學報(人社版)》2003.3(杭州，2003.05)；郁建興，《在政府與企業之間——以溫州商會為研究物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溫州民間商會——民主價值與民主發展的困境〉，《開放時代》，2003.3(廣州，2003.06)。

<sup>21</sup> 浦文昌，《市場經濟與民間商會——培育發展民間商會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由此看來，新時期的商會、行業協會研究不僅是關係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體制改革所必應考慮的重要議題。在現階段，商會之制度創設是研究的重點，而在商會得到更高程度發展以後，商會之影響必將深入到整個社會。可以發現，商會不僅是當代大陸改革的題中之義，也是一個具有廣闊前景的學術領域。當代各學科的交叉研究不僅展示了各具匠心的學術視角，也展示了商會組織豐富多彩的制度內涵。這些不僅足以鼓舞我們繼續民國時期同業公會的研究，以接續商會、同業公會的歷史，而且對於開闊研究的視野具有重要啓示作用，自不能以漠然視之。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發現在商會史上曾經解決的問題當代又重新出現，而其解決方法或許可以借鑒，此正借古知今之理。

### 三、海外華商會之研究概況

港澳臺地區商會走的是與大陸不同的發展道路，但均可稱成功。這或許提醒我們，在商會建設之道路上，制度選擇的模式並非單一，關鍵是要適於地方之政經特點；也同樣提醒我們，在商會史研究的評判之中，標準並不能過於單一，多元化、多角度的分析或許更切實際。出於資料方面的因素，港澳臺地區商會研究主要由當地研究者進行。

香港的中華總商會自 1900 年成立之後保持著連續性的發展，在 1949 年之後及改革開放時期都與內地工商界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繫，對於香港工商界的成長發揮了重要組織引導作用。香港的商會組織並非單一的，除中華總商會外，香港還有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中華廠商聯合會等商會組織。由於香港本身的特殊性，香港商會也具有獨特的開放性。澳門亦

在 1912 年前後成立了商會，一直延續至今，在澳門商界也具有很高地位。臺灣在日治時期的商工經濟會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1945 年後解散原有商工會，重新成立了臺灣省商會聯合會，於 1973 年改組為臺灣省商業會，發展至今已有縣市商業會及行業同業公會等團體會員 100 餘家。在海外，如東南亞、歐美、日本等地，也有眾多華商組織的海外華商會組織。大陸的商會研究在早期由於資料及力量之限制，主要集中在對上海、天津、蘇州、漢口等地商會的研究，較少涉及到港澳臺及海外華商會，及至目前這一現狀也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對港澳臺及海外華商會的研究主要由該地學者進行。

關於香港中華總商會及其它在港商會相對研究較多。張曉輝的《香港華商史》討論了香港華商發展的歷史，其中也涉及到香港四大商會的發展狀況。<sup>22</sup>另在香港華商總會所辦刊物之中，也有相當多的文章對其自身的發展歷史進行介紹，如曹學愚所編《香港華商總會之沿革》、張圭陽的《華商會所百年》。<sup>23</sup>周佳榮、鐘寶賢、黃文江所著的《香港中華總商會百年史》是研究香港商會史的代表作之一，該書運用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刊、年鑒及其它專藏資料，研究了香港中華總商會從 1900 年到 2000 年間的百年史，涉及到該會的初創、奠基、戰爭、戰後、回歸等階段的發展歷程。在初創階段為華商公局，後為香港華商總會，後又改為香港中華總商會。該

---

<sup>22</sup> 張曉輝，《香港華商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

<sup>23</sup> 曹學愚（編），〈香港華商總會之沿革〉，《香港商業年鑒》（香港：香港華商總會，1951）；張圭陽，〈華商會所百年〉，《華商會所百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華商會所，1997）。

會根植於香港，維護工商貿易，關注社會民生，教育事業，並參與政制發展。總商會與世界各地華商會有著緊密的聯繫，有利促進了中外貿易交流。同時，中華總商會心系中華，積極參與祖國建設，發展與內地經貿易協作關係，為香港回歸作出了貢獻。<sup>24</sup>何佩然對 20 世紀 50 年代興起的香港新界沙田商會進行了個案研究。<sup>25</sup>不過由上述也可見到，關於香港中華總商會之研究較多，但對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等其他商會的研究還很少。澳門中華總商會自 1912 年成立之後，亦保持了連續性的發展。就目前情況來看，關於澳門地區商會只有一些介紹性的文章，尚無專題性的研究論著。

關於臺灣商會的研究主要以臺灣學者為主，早期對臺灣商工團體的研究多集中於清代「郊」的探討，後則以日治時期為主。蔡淵黎的《清代臺灣行郊的發展與地方權力結構之變遷》一文討論了清代臺灣的商人組織—行郊的組織形式、權力運作，他認為行郊是商人參與地方事務的重要社團組織，這是清代臺灣社會的顯著變化。<sup>26</sup>此外，還有廖漢臣的《商工會議所制度及臺北商工會議所》、趙祐志的《台、日實業家與臺灣總督府的分合關係(1895—1937)—以商工會為中心之探討》、〈日據時期臺灣的商

---

<sup>24</sup> 周佳榮、鐘寶賢、黃文江，《香港中華總商會百年史》（香港：香港中華總商會，2002）。

<sup>25</sup> 何佩然，〈地方經濟力量的興起與衰落——香港新界沙田商會的個案研究〉，「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討論會」論文（香港，2000.7）。

<sup>26</sup> 蔡淵黎，〈清代臺灣行郊的發展與地方權力結構之變遷〉，《東海大學歷史學報》，7（臺中，1985.12），頁189-207。

工會與商業經營手法的革新——以「拍賣」、「廣告」技術為例〉。<sup>27</sup>侯家駒的《我國的行會與同業公會》在討論行會及同業公會之整體發展淵流之外，對於現在臺灣的同業公會情況也進行了調查，對其數量、組織、會費、活動有所概述。他認為，台灣同業公會不似西方基爾特之強制性，與德日等國也有明顯差異。台灣同業公會系以廠際組織，動用集體爭議力，來增強會員之外在經濟。<sup>28</sup>趙祐志以日治時期的臺灣商工會為主題，撰寫專著《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1895-1937)》。該書首先討論商工會的創設、傳播與背景。在功能方面，商工會在革新商業經營、交流商業技術、凝聚眾商之力、領導地方民眾、創建經營條件方面均有突出表現。日治時期，臺灣商人的企業精神與經營理念已有所提升。該書對台、日商工會及殖民政府三者間之交互關係亦有詳細分析。在殖民時期，臺灣商工會為日本之經濟控制具有重要作用，但並不盡是「低度發展」，由其帶動草根商人之建立現代企業精神、成立民主式的組織，發揮民主功能，亦有其發展的一面。<sup>29</sup>

---

<sup>27</sup> 廖漢臣，〈商工會議所制度及臺北商工會議所〉，《臺北文物》，5:4(臺北，1954)。趙祐志為研究臺灣商會的主要代表，相關論文有趙祐志，〈台、日實業家與臺灣總督府的分合關係(1895-1937)——以商工會為中心之探討〉，《歷史學報(臺灣師大)》，22(臺北，1994.06)，頁267-313；〈日據時期臺灣的商工會與商業經營手法的革新——以「拍賣」、「廣告」技術為例〉，《史耘》，創刊號(臺北，1995.09)，頁181-244。

<sup>28</sup> 侯家駒，〈我國的行會與同業公會〉，《東吳學報》，3(臺北，1973.09)，頁67-78。

<sup>29</sup> 趙祐志，《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1895-1937)》(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

海外華商會的研究的重點集中在東南亞地區。丁進軍、袁丁介紹了晚清時期海外華商會的簡況並介紹相關資料，總的看來，晚清政府與海外華商之聯繫也主要體現在東南亞的華商會方面。一些不少學者運用網路論(Network Analysis)、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等理論，將商會與亞洲商業網絡、華商網路結合起來取得了新的進展。莊國土對 15-19 世紀初海外華商的經貿網絡進行了分析。<sup>30</sup>袁丁分析了清政府與泰國中華總商會之關係，他認為在晚清時期政府已改變對海外華僑華人的態度，其顯著變化就是鼓勵和提倡海外華人成立中華商會，以加強海外華人之聯繫及促進經濟發展。清政府不僅支持泰國中華總商會之成立，對於商會在當地所遇困境也常常通過外交手段予以援手。<sup>31</sup>臺北國立成功大學郭人豪的碩士論文〈晚清商務改革與海外華商關係之研究〉即以「商戰」的論述過程作為本論文的主脈絡，分析晚清商部創建及其與海外華商聯絡之關係。清政府一方面積極拉攏著名的南洋富商張振勳回國投資各種新式企業；另一方面則創設商部，實施重商政策，吸引橋資即為其要政之一。政府並立即張振勳擔任考察南洋商務大臣兼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前往南洋招商回國投資，落實聯絡海外華商的政策。張振勳不僅催生了中國的商部，同時也為商部制訂了海外招商的政策，又在南洋成立第一個效忠清朝政府的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新加坡中華商會的成立及其與清朝政府的關係成為往後海外華人商會仿效的典範，清政府不僅透過此一組織來監

---

<sup>30</sup> 莊國土，〈論15-19世紀初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發展——海外華商網絡系列研究之二〉，《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2(廈門，2000.04)。

<sup>31</sup> 袁丁，〈清政府與泰國中華總商會〉，《東南亞》，2000.2。



視與控制海外華人社會，同時也作為招徠華僑資本與團結國內外華裔的工具，作為與西方人競爭的憑藉，進行名副其實的「商戰」。<sup>32</sup>新加坡學者劉宏在對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研究中認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在亞洲商業網絡制度化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在 1949 年之前，中國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最密切的網路夥伴，二戰結束後 20 年間，其地位被馬來西亞和印尼所取代。而其間，日本和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香港、臺灣等地區也都屬於總商會相關網路範圍之內，雖然它們在這種橫向的制度聯繫中處於次要地位。除這種各國和各地區之間的互動模式之外，總商會還在區域化進程中起著關鍵的仲介作用，並試圖為東南亞的華人商會建立一個正式的和永久的聯絡機構，以推動華裔之間交流的系統化。<sup>33</sup>劉天鳳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滄桑史〉一文則較為全面的介紹了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發展及其演變歷程。<sup>34</sup>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華人社團的跨國界發展-以「世界華裔大會(WEEC)」為例〉實際上也研究了海外華裔的結社行為，他通過華人社團的發展歷史脈絡分析新加坡所創建之世界華裔大會，作者認為世界華裔大會孕育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這一特定時空背景，是在國際環境、大陸與台灣、居住國、新加坡與華人等因素的利害關係取得均衡的情況下成立的，而且其內部存在著各方的安全和利益方面的

---

<sup>32</sup> 郭人豪，〈晚清商務改革與海外華商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3）。

<sup>33</sup> 劉宏，〈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與亞洲華商網路的制度化〉，《歷史研究》，2000.1（北京，2000.02）。

<sup>34</sup> 劉天鳳，〈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滄桑史〉，《南洋文摘》，5:10（香港，1965），頁28-29。

考量。他認為世界華商大會成立的最大意義，是抽象的世界華商成為具體的政治經濟實體。新加坡藉提倡成立世界華商大會，獲得了世界華商的領導地位，與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戰略相吻合。世界性華人社團欲持續發展，應使華人社團的活動與運作滿足所有華人和有關國家，以符合他們的安全和經濟利益需求。<sup>35</sup>

除新加坡外，馬來西亞之華商及華商會亦是研究較為集中的主題。相關著作有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禹如鍵的碩士論文〈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Philippin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研究(1904-54)〉。<sup>36</sup>陳福壽的〈菲華商聯總會之研究〉研究了菲律賓華商聯合總會之成立始末，敘述商總成立之背景、及商總產生前商聯之建立、商大之籌開經過，論述商總之組織－會員與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秘書處等之執行工作情形，並探討理事會下之外交、聯絡、組織、福利、工商、調解、財務、經濟、大廈管理、青年合一等十委員會之功能。文章並討論了商總與中國及中菲關係之內在貢獻，也分析了商總與馬尼拉中華商會之間並的不和諧因素，反映了海外華商網絡的另一面相。<sup>37</sup>

日本是華僑較為集中的地方，日本與近現中國之經濟聯繫亦極其緊密，因此華商會亦相對發達。陳來幸以日本神阪地區中華總商會為例，探

---

<sup>35</sup> 柳時和，〈華人社團的跨國界發展-以「世界華商大會(WEEC)」為例〉(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sup>36</sup> 禹如鍵，〈菲律賓岷里拉中華商會(Philippin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研究(1904-5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sup>37</sup> 陳福壽，〈菲華商聯總會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討了海外中華總商會的社會機能與網路作用，認為同日本和歐美相比較，歷史上中國商會的特點之一便是與海外中華總商會保持互惠而密切的網路關係。神阪華商總會成立之後，神阪地區的華商隨之正式加入了以華商聯合會為總機關的世界商會網路。<sup>38</sup>

這些研究表明，海外中華商會不僅對團結各地華人，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加強了國內與海外華商間的交流與互動，有助於地區商業網絡的形成。李明歡在《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一書中總結認為，<sup>39</sup>海外華人社團分為業緣性、血絲性及地緣性。<sup>40</sup>此外，對於歐洲、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國各個地區的中華商會的介紹也有一些，但研究則十分不足。在這些國家的中華商會成立時間也相當之早，並多保持了連續性的發展，對於拓展華人在海外的自下而上空間的意義不言而喻。

在 2004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山西平遙中國商會博物館、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商會與近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也有不少論文涉及到港澳臺及國外華商會研究。<sup>41</sup>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李培德分析了 1940 年代香港華商總會的選舉風潮，在這次選舉風潮中，中國共產

---

<sup>38</sup> 陳來幸，〈海外中華總商會的社會機能與網路作用——以日本神阪地區中華總商會為例〉，「首屆商會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天津，2000)。

<sup>39</sup> 李明歡，《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

<sup>40</sup> 方雄普、許振禮，《海外僑團尋蹤》(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年)。

<sup>41</sup> 關於會議之具體情況及論文觀點，請參見：魏文享，〈“百年商會看今朝”——“商會與近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國際學術動態》，2005.1(武漢，2005.01)。

黨與國民黨之勢力均參與其中，對於選舉結果有著重要影響。<sup>42</sup>日本青山學院大學飯島涉對日本與中國商會之關係進行闡述，尤其詳細介紹了在華日本商會的資料分佈情況，為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文章討論了日本國內主要商會及在華日本商會。作者認為，日本商會是在日本對外關係特別是對華關係的政治情勢之強力左右下發展其活動。從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日本商會與中國商會之間可說有相當緊密的關係，然而到 1920 年代，關稅問題所造成的對立趨於明顯，從 1930 年代到日本戰敗這段時期，隨著佔領地的擴大，日本商會的開設也不斷增加，但這些商會在日本戰敗之際隨之崩解，其原因日本在華商會與軍事政策一體化發展之故。<sup>43</sup>這兩篇論文或可認為是海外華商會研究之新進展。但相對於當代大陸商會、民國時期之商會而言，港澳臺商會及海外華商會之研究更為滯後。在新時期，海外華商會不僅是中國商界走出國門的紐帶，也是吸引海外華商投資的仲介。但由於國內商會建設的滯後，海內外商會的互動與交流還遠未順暢，經濟資訊亦為之阻隔。大陸亦當加強商會建設，並加強對海外華商會之研究，為真正構建全球華商網路而努力。

#### 四、 整體史及多元視角下的商會史研究

以上所言，或可視為成績。但如結合與商會史研究之總況及其學術價

---

<sup>42</sup> 李培德，〈香港華商總會選舉的政治風潮〉，「『商會與近現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平遙，2004.9)。

<sup>43</sup> 【日】飯島涉，〈日本商會與中國〉，「『商會與近現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平遙，2004.9)。

值相較，可以發現，已有之商會史研究仍存在相當多的不足。結全本文論述及已有學術評述，姑分以下幾點言之：其一，由時空受限而導致的主題受限的情形愈趨嚴重。商會史研究的時段多限於晚清民初，對於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研究，特別是對抗戰時期商會的研究還十分不足，這一點已有眾多學者指出。根據本文之總結可以發現，學界對於 1949 年前後之商會制度轉型也多有忽視。同時，在歷史分期的丘壑之下，近代商會史與當代商會史之間的聯繫被人為割斷。當代商會研究在學術研究、實地調研、改革實驗的結合方面具有鮮明特點，其中許多研究方法及提出的問題對於商會史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啟發性。在地域方面，以上海、天津、蘇州等城市為代表的商會研究相對集中，而對全國範圍則缺乏整體性的認知；對大陸商會相對集中，對港澳臺地區及國外華商會之研究極其缺乏。其二，在提倡跨學科方法進行歷史研究的同時，各學科間關於商會的研究卻相互隔離。在史學研究領域，政治學、社會學的相關理論運用不少，但不少史學研究者對於當代商會、行業協會的情況卻完全視而不見，對當代的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領域的商會研究成果也關注不夠。而當代商會的研究者對商會之歷史也缺乏足夠瞭解，由此阻礙了對中國商會史形成縱橫全面的認識。其三，新近之研究雖然不乏新問題的提出與新史料的發掘，但據實而論，相當大一部分是在舊有史料基礎上的重複性研究。目前商會史研究所依據之主要史料仍是較早幾部商會檔案資料集，地域限於津滬幾地，其他地區商會檔案資料未得到大力發掘，因此造成言商會必稱津滬的局面。以上海、天津或者蘇州商會之重要性看如此並不為過，但長期如此則必然遮掩了近代商會發展的全貌或者地區性特點。此外，在「選精」法

與「集粹」法的寫作模式下，不同之史料被作單一解讀，或者同一史料作反復遷移使用，其間並無新意可言。<sup>44</sup>其四，史學研究與應用研究相互隔離，歷史經驗難以致用於當代商會發展。當代大陸商會及行業協會改革已進入到了關鍵性階段。不僅學界討論紛紜，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管理部門、工商聯、統戰部，及至各地商會、行業協會工作人員，各主要行業之工商企業，都對之表示極大關注。北京、上海、溫州、漢口、廣州等地方政府已在推行試點改革，但在改革過程中均遇到制度性難題。要突破困境，需要從歷史中吸取合理制度內涵，需要對有關問題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史學研究雖未可刻意逢迎現實需要，但面對中國大陸商會復興的特殊課題，如果不能夠科學總結歷史上商會發展的利弊得失，發揮資治的功用，卻是近二十年商會史研究的悲哀。

基於此，著名學者章開沅先生在 2004 年 9 月平遙的商會討論會開幕式上講話就頗值深思。章開沅先生是商會史興起的首倡者，雖然他沒有具體從事商會史研究，卻一直引導、關注著近代中國商會史的研究。他說，商會史研究能夠從無到有、從不經意的檔案整理成長為史學研究的奇葩，是沒有想到的。這裏既有學者的努力，也有現實因素的推動。經過近二十餘年的發展，商會史研究成果累累，也預示著以後的商會史研究的起點更高了。關於如何揚長避短，奮力求進，章開沅先生提出三點意見：其一，學術研究要與應用研究結合起來。他認為，應用研究是當代商會研究的主

---

<sup>44</sup> 關於「選精」法及「集粹」法之含義，請參見：李伯重，〈“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的農業革命——對傳統中國經濟史研究法的檢討〉，《中國社會科學》，2000.1(北京，2000.01)。

流，在這個意義上，史學不僅是集體記憶，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可以資之於當世。他強調學術獨立，也提倡史學參與，這二者是不矛盾的。真正有生命力的史學不是功利的史學，是用客觀、公正、科學的態度追求高品質的學術成果。其二，專題研究與綜合研究要結合起來。商會史研究在早期發展過程中以細化的、具體的研究為多，這也是很需要的，但到一定程度就要有整體性的研究，要有宏觀性的研究，如大中華圈商會的研究，否則就將純粹知識轉化為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其三，強調要走自己的學術之路，不排斥運用西方理論，但要注重在實證的基礎之上歸納自身的特點。章開沅先生的看法得到與會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在討論會期間，他的觀點不斷被學者引用。商會史發展的未來方向，或許正應在這幾點上用功夫。<sup>45</sup>

要將學術研究與應用研究、專題研究與綜合研究、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結合起來，首先要在史觀上有所改進，要將歷史與現實、大陸與海外商會研究融會起來，就需要有整體史的觀念。在此觀念之上，才能發掘出新的有學術價值的問題。在具體的專題研究上，則需要有多元化的研究視野，在實證研究之基礎上綜合運用各種分析方法，才能夠推陳出新，更上層樓。由此，應當將代商會及海外華商會之研究納入討論視野。在時間上，當代商會是歷史上商會在中斷之後的重續。雖然當代商會發展所遭遇的制度環境與近代相異，但商會興起的內在機理仍有相似之處。近代商會之發

---

<sup>45</sup> 關於此次會議之綜述，請參見：魏文享，〈“百年商會看今朝”——“商會與近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國際學術動態》，2005.1(武漢，2005.01)。

展道路同樣歷經曲折，其累積的經驗與教訓對於今日之商會建設無疑是一筆寶貴的歷史財富。在空間上，海外華商會在大陸商會中斷之後仍在繼續發展，並根據各地之政治經濟特徵發展出具有各自特點的商會制度。在大陸商會重興之後，海外華商會不僅與大陸經濟重新聯結，也意味著海內外商會活動空間的擴展。

循上述思路，未來之商會研究或許應在以下幾個方面做些努力。其一、貫通歷史與現實，系統總結商會發展的歷史經驗、現實問題與發展方向。商會的歷史縱貫近現代中國，但商會研究卻條塊分割，歷史與現實之間、地區之間、學科之間均缺乏深入地交流互動，極大影響到學術研究的進步與當代商會建設的理論總結。因此，商會史學者應當有些現實關懷，而當代商會研究也應多些歷史記憶。其二、以商會與近現代中國社會為基本研究視角，廣泛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和各學科研究方法，以商會與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中的重大問題為中心，來探討商會制度的演進、商會與政府關係、商會的政治參與、商會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商會與國家形態間的複雜關係等種種問題，理順制度、機制與體制方面的經驗與教訓。其三、以整體史觀及多元視角透視商會之真面相。在近代商會史中，學界已從不同角度運用了運用市民社會理論、第三域理論、公共領域理論來分析商會與政府之關係及其職能效應。在當代商會研究中，關於非政府組織、非營利部門理論的運用也十分普遍。這說明，商會作為近現代中國社會組織的一個縮影，其制度內涵與影響已遠超出純經濟的範疇。只有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才可能將商會存在的社會與法理基礎、商會的組織與運作原則、商會與其他民間社團之關係、公民社會與國家關係、經濟市場化、政



治民主化與公民社會的發展等問題進一步深化。其四、聯結大陸與海外，關注大陸商會、港澳臺商會、東南亞、日本及歐美華商會的各自特徵及相互聯繫，吸收海外經驗的合理部分，促進當代海內外商會之交流與合作。其五、兩岸三地學者及國外學者之間要加強交流與合作，大力發掘優勢史料，各盡所長，共同合作。惟有如此，在促進當代大陸商會與海外商會的經貿聯繫的同時，才能促進海內外商會史研究的整體進步。

